

HEERBATE WENJI

○ 哲学卷一

赫尔巴特文集



1

浙江教育出版社

哲学卷一

赫尔巴特文集

HEERBATE WENJI



浙江教育出版社

赫尔巴特文集

编委会成员：顾明远 金 锵 骆 丹 曹成章
郭官义 李其龙 孙祖复 庞学铨
徐忠良 张伟建

哲学卷主编：郭官义

翻 译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艳民 冯亚琳 刘学慧 伍竞先
李 黎 莫光华 郭官义

校 订：郭官义

教育学卷主编：李其龙

翻 译 （按姓氏笔画排列）：

邓艳红 朱刘华 朱更生 李张林
李其龙 陈 慧 胡劲松 徐斌艳

校 订 （按姓氏笔画排列）：

孙祖复 李其龙 徐长根

心理学卷主编：李其龙

翻 译 （按姓氏笔画排列）：

陈国鹏 徐小青 徐斌艳

校 订 （按姓氏笔画排列）：

李其龙 徐长根

前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全世界兴起了一场进步教育运动,它在欧洲被称为“新教育运动”,在德国被称为“改革教育运动”。这场运动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停止了。当在战后初期德国又重新发起这一运动时,德国著名教育家H.诺尔(Hermann Nohl)在“改革教育运动”大会上以纪念赫尔巴特的报告作为大会的开幕词。他说,“这也许是自相矛盾的”,但是,“恰恰在我们探讨教育学新问题时必须研究他”。

在赫尔巴特时代已经过去了近两个世纪的今天,在新的教育思想不断涌现的当代,我们选译了《赫尔巴特全集》和赫尔巴特的其他散篇论文,也正如诺尔所说的,是因为“恰恰在我们探讨教育学新问题时必须研究他”。

1

一、生活与实践

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1776~1841)是德国著名的教育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从19世纪中叶以来,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教育家能像他那样对学校教育实践有如此直接、如此广泛、如此巨大、如此久远的影响。在西方教育史上,他被誉为“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他的教育理论代表作《普通教育学》被视为教育史上第一部具有科学体系的教育学著作。德国杰出的教育史学家鲍尔生写道:“在很长的时期里,人们便把‘赫尔巴特

理论’和‘科学教育理论’作为同义词。”^①

1776年5月4日，赫尔巴特生于德国北部的一个小城市奥尔登堡。其父亲是一个司法官，祖父曾当过文科中学的校长。赫尔巴特的母亲颇有教养，聪慧而意志坚强，赫尔巴特从小在她的熏陶下成长。

赫尔巴特幼年时不幸跌入沸水中，以致童年时期身体一直很虚弱。但他母亲并不因为他是独生子，因为他身体很虚弱而放松对他的严格教育，恰恰相反，她让他穿得比较单薄，睡硬板床，要求他按时起床。赫尔巴特的母亲为了使自己的独子不至于孤独无伴，将来变得不合群，还特意领养了比赫尔巴特小1岁的侄女，让他俩作伴。

因为当时奥尔登堡还是一座未开发的城市，公立学校条件较差，所以赫尔巴特的母亲为他请了家庭教师，让他在家中读书。她对家庭教师的选择是相当明智的。这位家庭教师是沃尔夫学派的哲学家于尔岑(Ültzen)，有比较丰富的教育经验。赫尔巴特在他的教育下，在语言、逻辑、哲学等方面得益匪浅，很早就对哲学萌发了浓厚的兴趣，并接触到了许多关于沃尔夫哲学、心理学和伦理学方面的问题。

1788年，12岁的赫尔巴特进入奥尔登堡拉丁语学校（该校于1792年改为文科中学）二年级学习，并于1794年从该校毕业。在这期间赫尔巴特勤奋好学，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在学校他爱好哲学，并从那时就开始钻研康德的哲学思想了。他对物理、数学和历史的学习也相当投入，同时在课余，他还学习了钢琴、小提琴等四种乐器与谱曲，11岁时他已能登台演奏钢琴了。1808年，他还发表了一首由他自己创作的奏鸣曲。他在17岁时曾为毕业班同学作了题为“略论一个国家中道德兴衰的一般原因”的报告。从报告中可

① [德]弗·鲍尔生：《德国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页。

以看出他所受法国革命的影响。这一报告受到了好评,并被刊登在当地一家地方杂志上。在他毕业时,他用拉丁语作了讲演,对西塞罗与康德的至善观念与实践哲学原理作了分析比较,深受赞许。他的毕业评语写道:“在毕业生中,如同在他所有的同学中那样,赫尔巴特始终以守秩序、有良好的操行、学习用功和顽强著称,并且通过孜孜不倦的学习使他自己出色的天赋得到了发展与训练。”^①

中学毕业后,赫尔巴特面临读什么大学和什么专业的抉择。他自己很想读哲学,而根据他父亲的意见他应该读法学,今后成为一名律师或司法官。赫尔巴特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服从了父亲的决定,但他要求去远离家乡的耶拿大学,因为当时耶拿大学是德国哲学研究的中心,被誉为“精神王国的大都会”。赫尔巴特于1794年进了耶拿大学学习法学,然而他却完全被哲学所吸引。

赫尔巴特进入耶拿大学的那年,正巧大哲学家费希特开始在学校任哲学教授。赫尔巴特不久就成了费希特热诚的学生。他对费希特的教学评价极高,但是,虽然他非常感激这位导师的教诲,认为没有费希特自己将在哲学方面一事无成,却渐渐地成了费希特哲学的批判者,并与费希特的哲学思想分道扬镳,走上了独立的道路。他在他后来发表的《一般形而上学及哲学的自然学说开端》一书中,花了很大的篇幅对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在耶拿,赫尔巴特的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他加入了“自由协会”。该协会每隔两周聚会一次,由各会员发表文章与评论,开展讨论。议题常常是法国革命、康德和费希特哲学以及当代德国新诗,特别是席勒与歌德的诗作。赫尔巴特在那里结识了一些进步学生,受到了他们进步思想的影响。协会有时候也探讨一些现实政治问题。在这方面,赫尔巴特认为,每个人应树立公民意志,而公民意

^① 转引自[德]G.魏斯:《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传略》,朗根萨尔察,1926年版,第10页。

志主要表现在行动上,这种行动可以是政治活动,也可以是教育工作。他自己毫无疑问地选择了后者。

自赫尔巴特来到耶拿后,其母亲因与她不相融洽的丈夫生活一起颇觉孤独寂寞,于是便离开丈夫移居耶拿与赫尔巴特住在一起。她在耶拿大学结识了不少教授,也结识了席勒,与他建立了友谊。她有意识地通过这种友好交往使赫尔巴特受到席勒的影响,并使他同席勒建立了友谊。

赫尔巴特和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一样也当过家庭教师。1797年,赫尔巴特依照母亲的意见,到瑞士一个贵族——施泰格尔家里当家庭教师。赫尔巴特对施泰格尔家的教学条件相当满意。施泰格尔很赏识赫尔巴特的才华,放心地将其3个孩子交给他管教。赫尔巴特不仅在那里得到了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而且获得了进行教育实践的好机会。他认真地分析了3个孩子的个性特点,制定了针对他们的教育计划。他努力激发他们的多方面兴趣,与他们建立了融洽的师生关系。这时,他心中一直萦绕着道德教育的问题,思索着本性与道德的关系。他渐渐形成了这样的观念:道德教育必须激发本性的力量,而不是抑制或者削弱这种力量,因此在孩子早期应当尽可能少地惩罚他们,不要对他们有太多的规定与限制,特别是不要对他们施加压力;只有通过启发心智,促进想像力的发展,才能净化儿童的本性,因此应当防止对他们进行单纯外加的管理和长时间的监督。家庭教育的实践活动丰富了赫尔巴特的教育经验,这对他以后教育理论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开始对教育萌发越来越大的兴趣。在瑞士,他拜访了当时已负盛名的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听了裴斯泰洛齐上的课,与他结下了忘年之交。这位53岁的教育家常常从布格多夫前往伯尔尼看望赫尔巴特,^①两人频繁交往,切磋教育问题。赫尔巴特后来成了第一个在德国用文字传播裴

^① 德国研究赫尔巴特的专家阿施穆斯认为,有关裴斯泰洛齐常去伯尔尼看望赫尔巴特的说法,出自施泰格尔的日记,当时施泰格尔已74岁高龄,可能是把事情颠倒了,事实可能是赫尔巴特常去拜访裴斯泰洛齐。——译者注

斯泰洛齐教育思想的人。他在1802年发表的《论裴斯泰洛齐的新作——〈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一文中,形象生动地、富有启发性地介绍了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

赫尔巴特在瑞士的时期正好是欧洲发生政治大地震的年代。法国革命冲击着欧洲。这导致了瑞士贵族统治的崩溃与法国式的共和国的诞生。施泰格尔作为瑞士很有影响的贵族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赫尔巴特的工作一度受到影响。他对当时的政治缺乏热情,希望在伯尔尼风景秀丽的平静环境中不受干扰地工作若干年。但他不能如愿以偿,政治事件阻碍了他的这种想望。同时,其父母要他回乡谋取一官半职。于是他于1800年辞去了家庭教师的工作,回到奥尔登堡。

这时候,赫尔巴特内心充满着矛盾,他自己希望研究哲学,将来争取在大学中谋一个教席,而他母亲要他从事一种实际的职业,她深信哲学不会产生面包。正当他处在困苦之中的时候,友谊给他带来安慰。他原来大学里的朋友施密特,当时不来梅的一位议员,写信邀请他去不来梅。于是他应邀前往不来梅,在那里他得以继续从教和研究哲学。他一面接受了为一位青年准备大学学习的工作,担任一所教堂学校的数学教学工作,并给三位贵妇人上课,一面进行自己的研究与写作。他的思想渐趋成熟。他被邀请对文科中学改革提建议,在不来梅学术团体“博物馆”作教育学讲演。正是在那里他开始利用他在瑞士获得的宝贵经验,结合他的哲学研究,尝试从哲学的角度说明教育目的。他首次在当时声望很高的学术杂志《格丁根学术指南》上发表了论文。

1802年赫尔巴特从来梅移居格丁根,在那里既作为一些年轻人的教师,又作为学生听格丁根大学开设的法典和高等力学等课程。他与许多青年交往,并建立了一个新的“自由协会”。不久他通过了博士学位考试,稍后获得了教授备选资格,开始了他的大学教学生涯。他作为讲师在格丁根大学讲授哲学与教育学。刚刚走上大学讲台的他必须加倍努力把课教好,而他的努力并没有付诸东

流,他的讲演很快为人们所注意。3年之后他的影响越来越大。海德尔堡大学向他发出了担任该校正教授的邀请书。但他这时还迷恋着格丁根的学术环境,谢绝了这一邀请,宁愿接受格丁根大学对他担任副教授的聘请,继续留在格丁根进行教学和研究。

1806年他发表了著名的《普通教育学》,接着又发表了《形而上学要点》《逻辑要点》《一般实践哲学》等。1808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当时格丁根逐渐变得糟糕起来,“现在一切是如此阴暗,因此我常常认真地考虑离开这个地方”^①。正在这时,柯尼斯堡大学向他发出了接任该校康德哲学教席的邀请,于是他欣然接受,于1809年前往柯尼斯堡。他在给友人施密特的信中写道:“我能有此机会获得那个教席乃是意想不到的荣幸,我在少年时代学习柯尼斯堡哲人的著作时已常常在充满景仰的梦中渴望这一教席了。”^②

在柯尼斯堡,赫尔巴特度过了四分之一世纪,这是他学术生涯的高峰。当时普鲁士战败于法国,并被迫与法国签订了屈辱的《梯尔西特和约》。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立志进行教育改革,主张通过精神力量来补偿物质方面的损失。这一切也正符合赫尔巴特的愿望,他积极参与了改革教育的活动。他创办了教学论研究所、教育学研究班和附属实验学校,按照自己的理论来培训教师,并使他们有实践的机会。他认为,教育学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必须加以示范与实习。他定期向有关教育当局汇报他的实践工作,受到了高度重视。他被聘为柯尼斯堡“公共教育学术团”的成员,负责考核高级中学见习教师以及文科中学毕业生,审核教科书、教学计划,后来还担任过该机构的主席,并在1829年被任命为教育委员。

他在柯尼斯堡大学的讲学颇受学生们的欢迎。他讲演时,教室

^① 转引自[德]G.魏斯:《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传略》,朗根萨尔察,1926年版,第39页。

^② [德]V.W.阿施穆斯:《赫尔巴特》,第1卷《思想家》,海德尔堡,1968年版,第268页。

里座无虚席,挤得几乎没有立足之地,不少学生在他上课前就在教室门口等候工友开门。与此同时,他大力开展心理学研究,撰写了《心理学教科书》《论数学应用于心理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等重要心理学著作。

赫尔巴特的住处与实验学校的学生宿舍正好在一起,因此他常常接触这些学生的家长。后者多数是官吏与贵族。这无疑对他的立场、观点有不可抹杀的影响。

1815年在维也纳召开的神圣会议结束以后,德国各邦的政府转向保守、反动,在教育上也开始采取反动措施。1824年普鲁士颁布反动命令,反动势力对大学进行严格控制。学生团体被取缔了,师生言行受到监督。赫尔巴特对这种监狱式的生活越来越感到不舒服,加上柯尼斯堡的气候对他健康不利,他便产生了离开那里的念头。但当时他的同事与学生对他的这个念头还是半信半疑,后来得知他真的接受格丁根大学的聘请,大家都深表惋惜。他们出于对他的崇敬,在他生日那天开了一个音乐晚会欢送他。

1833年他第二次到格丁根大学执教,当时大家对哲学的兴趣渐淡,而且学生的科学精神较差,但他的教学却越来越受到学生的欢迎,听他课的学生一如他在柯尼斯堡的时期。1837年威廉四世去世。新国王继位以后决定撤销1819年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宪法。七名教授联名抗议国王的这一行动,这就是德国历史上著名的“格丁根七教授事件”。当时身为格丁根大学哲学院院长的赫尔巴特虽反对国王的做法,但没有加入签名者的行列,并在国王开除这七名教授后避免与他们来往,这引起了广大学生对他的不满,并抵制他的课,听他课的学生大大减少。对此他写了《对格丁根危机的回忆》,希望能在他死后发表。他认为抗议行为不会有结果,只能给大学带来害处。他说:“评判德国人的政治生活能作出什么样的改善,能改善多少,这不是我的事情。我只能说,大学精神不能模仿政治生活,

因为大学的本质在科学之中。”^①

但是这一切不能消除他内心受到的打击。从此他感到生命的高峰已经过去。他的精力衰退了,尽管后来学生还是恢复了对他的热诚。

1841年8月11日他猝然昏厥,并于14日与世长辞。8月16日他的亲属、朋友和学生把他安葬在老式的阿尔巴尼教堂公墓。在他的墓碑上镌刻着这样的墓志铭:

探求神圣深湛的真理,
甘于为人类幸福奋斗,
是他生活之鹄的。
此刻,他的自由的灵魂,
充满光明,飞向上帝,
此地,安息着他的躯体。^②

二、政治观点与社会态度

赫尔巴特生活在欧洲大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当时德国是一个经济上落后,政治上分裂的封建王国。19世纪初,德国的资本主义逐渐发展起来,资产阶级也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刚刚诞生并逐渐成长的资产阶级力量极为软弱,但由于不能忍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已表现出对封建贵族统治的不满,有了争取自己地位与权力的要求。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德国中等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从1840年开始的,在这以前,已经有许多征象表明,这个国家的资本和工业阶级已经成熟到这样一种程度:它再也不能

^① 转引自[德]G. 魏斯:《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传略》,朗根萨尔察,1926年版,第57~58页。

^② [德]G. 魏斯:《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传略》,朗根萨尔察,1926年版,第59页。

在封建半官僚的君主专制的压迫下继续消极忍耐了。”^①

但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力量从封建势力手中夺取政权，表现出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矛盾心理。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德国资产阶级发展得如此萎靡、畏缩、缓慢，以致当它同封建制度对峙的时候，它本身已经同无产阶级以及城市居民中所有那些在思想上跟无产阶级相近的阶层相对峙了。它不仅看见在它后面有一个阶级对它采取敌视态度，而且看见在它前面整个欧洲都对它采取敌视态度。”^②

尽管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相当软弱，封建势力异常顽固，但受启蒙运动及法国革命的影响，德国各邦的君主迫于压力，多力求实行较开明的政治，努力发展教育，改革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个充满着“叛逆精神”的哲学、文学和音乐思潮，涌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文艺家，例如诗人歌德、席勒，哲学家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音乐家贝多芬等等。

赫尔巴特的政治观点与社会态度深深地打上了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潮流的烙印。他早期向往自由、解放与社会变革，希望建立一个讲道德、有理性的幸福社会。在大学学习期间他加入了“自由协会”，受到了不少激进同学的影响。在他彷徨时，“自由协会”使他振奋，使他充满信心。他说：“我要不断努力向上，带着火一般的热情不知疲倦地进行斗争——直到坟墓打开，太阳神把她的光芒播撒在我身上……”^③

赫尔巴特的政治观点与社会态度突出地反映在他的教育学著作中。他在其教育学论著中提出了“可塑性”这个教育学基本概念，明确地指出人人具有可塑性，人人都能受到教育。他写道：“每个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2页。

③ 转引自〔德〕G. 魏斯：《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传略》，朗根萨尔察，1926年版，第17页。

生不管其身份地位有何差别,都必须养成求学的习惯,使自己成为整个社会的有用之才……”^①同时,他认为人人都应受平衡的多方面的教育,“多方面性是没有性别、等级、时代差别的,它具有灵活性与普遍存在的可接受性,适合男女老少,任意地存在于贵族和平民身上……”^②。他还强调必须重视个性,追求个性的和谐发展。这一切都明显地体现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疑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倾向。

19世纪以前,德国各邦都实行封建等级教育。赫尔巴特明显地站在要求改革这种封建教育制度的旗帜下,与当时德国传统的教育制度相悖。他明确地提出国家不应干预教育,指出:“由国家方面来安排的教育最后却会违背国家本身。”^③

这显然表明了他企图使教育摆脱封建专制统治的影响,使其为资本主义发展服务并朝着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方向发展。

赫尔巴特一直关心着当时的国家和社会问题,并从理论上探讨这些问题,希望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他早年主张粉碎封建等级制度的枷锁,但他反对用法国式的暴力革命,而希望通过社会变革来实现。在大学期间,他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指出社会变革的杠杆是教育。他认为,通过教育可以培养德行,传递文化,从而形成人人讲道德的理想社会。因此,在他看来,教育更有希望实现社会的道德进步,乃至社会的进步。他写道:“责任感、注意各种原因、承认必然性、正义、善、美与效益——除此以外,治国艺术再也找不到其他支柱了。完美的安定是根本不存在的。对付巨大祸害的最大可能的保障就在于对整个民族进行道德教育。”^④

赫尔巴特的国家观与社会观具有温和的自由主义色彩。当时德国在国家学说方面存在着两个主要学派,一个是历史法学派,一

① 李其龙译:《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页。

② 引同上,第49页。

③ 转引自[德]B.艾伯特:《赫尔巴特教育学体系的作用》。

④ 引同上。

个是自然法学派。前者强调法的形成和发展是“国民精神”的体现,主张维护历史上业已形成的封建统治及其法权,认为论资排辈、等级制度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正统原则等都是合理的。对此,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提出过批判,说它是“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把农奴反抗鞭子——只要它是陈旧的、祖传的、历史性的鞭子——的每个呼声宣布为叛乱”^①。而自然法学派认为人类的理性是自然存在的,并从法律上论证了资产阶级解放的合理性。赫尔巴特的国家观介于自然法与历史法学说之间,是两者的妥协,但更接近启蒙运动的自然法思想,认为国家应当按一定的道德规范组织起来,应当是一种“理想的社会”。这恰恰与自然法学派主张建立理性社会的要求相一致。

在赫尔巴特生活的时期,德国出现了1815~1830年和1832~1840年两个政治反动时期,资产阶级争取到的某种程度的自由与民主等权力受到剥夺。反动势力对大学进行严格限制和控制,师生的言行、教授的讲义受到监督与检查。1819年,普鲁士政府利用激进派学生杀死了一个俄国奸细的机会,镇压学生和教师的自由主义运动。赫尔巴特对此表示反对,在他的讲演中指出他所感到的压抑,婉转地抗议政府的压制措施,呼吁不应当因为青年人的这种行为而侵犯学术自由。

但是,赫尔巴特的政治观点明显地反映了当时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的特征,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保守性。实际上他还出于当时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对资产阶级在封建专制下争得的权力感到满足,强烈主张维持现有的社会秩序,并写道:“我们生活在正统和自由的统治下,这种统治也许能够通过保护我们而持续地给我们带来幸福,只有在这种保护下才可能使我们如此从容地、如此无拘无束地……触及各种政治意见。”^②他一直希望保持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4页。

^② 转引自〔德〕B.艾伯特:《赫尔巴特教育学体系的作用》。

会秩序,主张通过对学生同情心的培养,“让他们了解他们在其一切社会关系中所具有的正确地位,并让他们感到其生存的全部条件与对他人的依赖性。通过同情心把这种感觉化为对所有人相互依赖的了解,通过越来越清楚地了解和越来越如所期待的那样明白社会运动在不断进行,乃至反复来回摇摆,儿童必然会珍惜一般秩序,不损害这种秩序,甚至觉得值得为这种秩序作出牺牲,假如有一次可能要求他立即作出牺牲的话”^①。

如果说赫尔巴特在年轻时还有一定的政治热情,参加并组织诸如“自由协会”等自由运动的话,那么到了老年,他的这种热情丧失殆尽,政治观点和社会态度更趋保守,这充分反映在他对1837年的“格丁根七教授”事件的态度中。当时人民纷纷对被撤职或驱逐出境的教授表示同情和声援,而赫尔巴特却没有站在广大人民一边,没有站在进步力量一边。他在回忆录中还避开七位教授的正确动机,而着重对他们的行动方式提出批评,为自己的做法辩解,强调政治兴趣在大学绝不是一种工作,但愿它尽可能远离大学。

与夸美纽斯、卢梭、裴斯泰洛齐与第斯多惠等伟大的教育家相比,无疑赫尔巴特缺少他们所具有的那样高的积极性去为社会进步而斗争。

三、哲学思想

赫尔巴特在年轻时期就对哲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深受莱布尼茨、沃尔夫、康德和费希特等大哲学家的影响,其中康德与费希特的哲学思想对他的影响特别深。但赫尔巴特并不停留在追随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学说方面,而是很快就另辟蹊径,独树一帜,站到了对康德,特别是对费希特的批判战线上。

赫尔巴特自称是个实在论者,他说:“这里我可以假定,人们从我的形而上学的主要观点出发可以了解我是个实在论者,我是在

^① 李其龙译:《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

驳斥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实在论的。”^①我们从本文集收编的《一般形而上学及哲学的自然学说开端》(下卷)^②《一般实践哲学》《形而上学要点》《哲学导论讲演提纲》《我与当代时髦哲学的争论》和《在康德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等赫尔巴特的代表性哲学论著中可以发现他的这一立场。

在作为其最有分量的大部头哲学著作《一般形而上学及哲学的自然学说开端》中,赫尔巴特明确地告诉读者,该书以“本体论”“关联论”和“意识论”等三编为核心。这三编集中、全面、明确地阐明了他的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哲学思想。在“本体论”这一编中他写道,“本体论的基础知识”就是“存在的概念”^③。本体论是研究实体的存在,即物的存在;本体论说明了实体(或者说物)是否存在,我们是怎样知道其存在的;本体论是研究实体存在于客观世界中,还是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的。“关联论”这一编主要阐明了事物的矛盾与认识的逻辑关联等方法论思想。“意识论”这一编则重点批判了费希特的唯心主义思想,阐明了赫尔巴特自己的实在论。他写道:“意识论应该考虑到知识的可能性。我们怎样才能接近给定的东西呢?”^④赫尔巴特旗帜十分鲜明地在其《一般形而上学及哲学的自然学说开端》中指出:“唯心主义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一个敌人,它阻挡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必须武装自己。”他列举了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命题,写道:“费希特的话更全面:‘在一切感知中,你真正感知到的仅仅是你自己的状况。’”^⑤赫尔巴特指出:“唯心主义

① 转引自[意]B. M. Bellerate:《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与德国科学教育的建立》,汉诺威,海曼·施洛德尔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② 因该著作上卷讲的是哲学史,后半部比较集中地阐述了赫尔巴特的哲学思想,故本文集只收编了其下卷。

③ 赫尔巴特:《一般形而上学及哲学的自然学说开端》,本文集哲学卷第2卷,第89页。

④ 引同上,第257页。

⑤ 引同上,第258页。

者决不认为人能够认识自己。”^①他说,费希特的唯心主义思想集中反映在其主要著作《人的使命》一书中。他列举了该书中的许多唯心主义提法,例如,“一切知识都只是映象,在知识里总需要有某种同映象相对应的东西。可是没有一种知识能满足这一要求。知识的体系必然是单纯映象的体系,它没有任何实在性……”^②“我之所以承认在我之外的某物,原因不在于我之外,而在于我本身,在于我固有的人格之局限性”^③。赫尔巴特指出,存在先于意识,而“唯心主义习惯于把意识,即把给定之物作为出发点”^④。他批判了费希特关于“概念是真正的造物主”“推论和现象不过是我们头脑中发生的某些事情”和“原初的真理似乎只存在于他的思路中”等唯心主义思想。赫尔巴特概括费希特的唯心主义思想说:“费希特学说的核心是严格的唯心论……在唯心论看来,世界只存在于知(das Wissen)中;而知是最高力量和惟一实在的存在、表现和完整的映象。”^⑤除了费希特的唯心主义以外,赫尔巴特对其他唯心主义也作了揭示,如他在其《我与当代时髦哲学的争论》一文中对当时以谢林唯心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时髦哲学的一些论点进行了批判。

那么赫尔巴特是如何驳斥费希特等人的唯心主义的呢?他指出:“严肃思考自我的问题,就是驳斥唯心主义。”他写道:“费希特在伦理学中开始把严格的自我概念,即能知者和被知之物的同一性归属于更高的,即更普遍的行动者和行动对象(das Behandelte)的同一性概念。假若费希特的这种做法有益于某种认识,而不会导致错误的推论,那就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是,他的这种做法恰恰有利于一种错误的推论,因为他说‘然而,思维在这里完全处于行动之外’,这是不可能的。思维活动是逻辑上更高级的概念;如果把

① 赫尔巴特:《一般形而上学及哲学的自然学说开端》,本文集哲学卷第2卷,第260页。

② 引同上,第260~261页。

③ 引同上,第262页。

④ 引同上,第266页。

⑤ 赫尔巴特:《论费希特的世界观》,本文集哲学卷第1卷,第247页。